

近世易代之际的
诗学观念与文化变迁

贺根民等



近世易代之际的
诗学观念与文化变迁

贺根民等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 近世易代之际的诗学观念与文化变迁 / 贺根民等著.

— 济南 : 齐鲁书社, 2017. 12

ISBN 978-7-5333-3427-7

I. ①近… II. ①贺…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研究
—中国—宋代—清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7439 号

近世易代之际的诗学观念与文化变迁

贺根民 等 著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

营销中心 (0531)82098521 82098519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4.5

插 页 3

字 数 351 千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3427-7

定 价 49.00 元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近世文学概念界定	1
第二节 近世易代之际诗学观念研究述评	6
第三节 复古主调下的创变倾向	20
第四节 诗学哲理传统的赓续和发扬	25
第五节 诗歌表达及批评的世俗化	30
第一章 宋元易代之际诗学的唐宋之争	37
第一节 宋元易代诗学唐宋之争概述	38
第二节 宋元易代唐宋之争的文化生态	47
第三节 唐宋之争的消解与化合	54
第四节 唐宋之争开明清诗学先声	88
第二章 宋元之际方回的唐代律诗演进观	99
第一节 方回的生平及律诗演变研究概述	102
第二节 方回的唐代律诗源流论	115
第三节 方回的唐代律诗正变论	133
第四节 方回的唐代律诗演变论	156
第五节 方回唐代律诗观对后代诗学的影响	171

第三章 元明易代诗学的情理之辨	180
第一节 简述古典诗学中的情与理	181
第二节 元明易代诗学的情理变迁	193
第三节 元明易代诗歌情理之辨的具体演绎	203
第四节 元明易代诗歌情理之辨的承变	268
第四章 清初文字狱与诗歌取向变迁	290
第一节 顺、康、雍时期文字狱概述	292
第二节 文字狱场域与文人心态嬗变	309
第三节 清初文字狱影响下的诗歌生态	339
第四节 文字狱视野下的诗歌取向流变	378
第五章 清初杭州词学思想与文化空间	396
第一节 “江村唱和”的空间观照	403
第二节 “江村唱和”与西湖景观	412
第三节 西湖文化与杭州词审美取向	427
第四节 清初杭州词学思想的文化意义	441
主要参考文献	452
后 记	458

绪 论

传统是过往时间的物化存在,诗言志和诗缘情标举了二水分流的诗学格局,它备经岁月的淘洗,并借以历代诗人的不懈咏叹和大力传承,建构成一座厚重精深的诗学大厦。一部诗学演进史,就是本土传统和外来资源不断对话和交流的过程。春秋时期发轫的传统诗学至西学东来的晚清,形成中国诗学的创造性转化,积累了独具民族文化意蕴的精神传统和艺术品格。赵宋以降的中国诗学逐步从古典和谐向近代崇高迈进,它承担着总结传统和开创未来的双重使命,鼎革之际的社会乱象和游移不居的文人定位深刻影响着诗学的书写风貌。绾合昔日以王朝更迭为阐述单元的梳理方式,聚焦于易代之际的诗学呈现,近世诗学凸显了民族文化自新的内在活力,它展示了乱世悲歌中未曾断裂的中国文化传统,彰显了不拘一格的诗学多色调特质。

第一节 近世文学概念界定

文学变革,代有所胜。“近世”一词多指历史断代,《汉语大词典》将其释之为“近代”,虽是一个历史分期的术语,但毕竟难掩其含混之色。作为一种时间断代,它至少在《荀子》中已经出现,《荀子·非相》云“凡说之难: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乱。未可直至

也,远举则病缪,近世则病佣”^①,《韩非子·五蠹》亦有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和当今之世的划分。“近世”在晚清民初再次进入学人的研究视野,1901年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阐发中国历史分期,就直接使用近世概念。1915年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云:“近世文明,东西洋绝别为二。代表东洋文明者,曰印度,曰中国。此二种文明虽不无相异之点,而大体相同,其质量举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名为‘近世’,其实犹古之遗也。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文明,移植亚美利加,风靡亚细亚者,皆此物也。”^②陈氏视近世文明为欧洲近代文明的替代,已具有历史分期的特征。以半部哲学史引领中国哲学史书写风范的胡适,其《中国哲学史大纲》有一宏伟擘画,将中国哲学演进厘定分三,即老子至韩非的古代哲学、汉代至北宋的中世哲学、北宋至晚清的近世哲学。相较而言,胡适的近世哲学认定,整体统摄了北宋至晚清的近千年哲学演变,展示了我国哲学固有传统与时代新质的融合。1933年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将自唐末至清末的一千余年统括为近古,稍后问世的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则将自明代至清末的时段称为近世。2003年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基于宋明理学脉络来梳理近世思想演变,2006年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则将16世纪至20世纪60年代视为论述时限。大致说来,中国史学界对近世的界定存有以西律中的印痕,然视其为一个整体的时间单元,亦是明确的事实。

照理说来,一个概念的提出并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必有其学理上的独到发明。尽管维系社会运行的宗法伦理传统远未坍塌,

① [战国]荀况:《荀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

② 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而在社会模式、价值观念诸方面,它已有脱离传统社会旧有框架的新鲜气象,士人主体意识随着社会变革而逐渐强化,即为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近代化。近世实现了从传统的农耕型社会向世俗的城市型社会的转变。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对中国文化赋予“了解之同情”,盘点中国文化演进,秉持内外结合的考察视野来重新审视中国文化走向,标举了影响中国至深的文化中心移动说和唐宋变革说。他按照中国历史每一时代的文化创造力和时代特点来建构中国史研究体系,将中国史划分为上古、中古(中世)、近世三个时期,这已非简单的时间层面上的断论,显示对社会体制和文化生态的最大尊重。1920年其《中国近世史》载:“中国的近世始于何时?过去都是以朝代更替来划分时代,这种方法倒是简单易行,但从史学的角度来讲,却未必正确。史学上所说的近世,并不只是以年代来划分的,必须看它是否具备近世的内涵。”^①内藤湖南认为“近世的内涵”体现在贵族政治的衰微与君主独裁政治的代兴、君主地位的变化、君主权力的确立、人民地位的变化、官吏任用的变化、朋党性质的变化、经济上的变化、文化性质的变化等八个方面,凸显自宋以降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变革。他断论唐宋之交是中国由中世向近世演变时代关口,清末为中国近世结束与走向共和的开始。他视宋代中国为一早熟的文明,并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阐发唐代与宋代的社会剧变。尽管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假说依照的是西方近代史学的设置,带有皈依西方现代性的色彩,但毕竟最大限度地体认了中国文化本位。而后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近代中国的文化生活》这两篇宋代近世假说的基础性的作品中,他集中而概括地阐发唐宋变革说。20世纪50年代以后,宫崎市定接续其师

^① [日]内藤湖南著,夏应元等译:《中国史通论》(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页。

内藤湖南之说,进而鼓噪宋代的社会转折意义。职是之故,缘于内藤湖南师徒的大力鼓吹,唐宋变革说和自宋至清千年一脉说获得了日本国内外的广泛认同,影响深远。海外剑桥中国史系列研究亦采纳此说,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亦将近代(近世)学术源头追溯至宋,如此广泛的认可和接续,标举了宋代近世说的引领地位,也为爬梳近世文学思想铺设了厚实的学术背景。

晚清民初以来,中国文学界流行一个相对稳定的近世概念。在中国文学史书写领域,“近世文学”作为一个概念常被文学史家们采用,而对于“近世文学”的起讫界限,未形成定论。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领域,“近世文学”和“近古文学”是一对时限近似的概念。1917年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撷取自汉末至南朝陈代的文学史料,条分缕析,以明文轨。按照刘师培的中古取舍范围,隋唐文学理应成为中国近世文学的开端,以致1918年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就将唐初文学作为近古文学的起点。1932年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指出当时中国文学史的编撰误区:“然这二三十年间所刊布的不下数十部的中国文学史,几乎没有几部不是肢体残废,或患着贫血症的。”^①他认为缺乏科学的体例和完备的内容,不足以展示中国文学演进的真相,究其原因,文学史的体系建构援引日人旧作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以致他认为:“他书大抵抄袭日人的旧著,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上古、近古、中古及近代的四期,又每期皆以易代换姓的表面上的政变为划界。”^②郑振铎将中国文学史划分为古代文学、中世文学和近代文学三期,在其看来,近代文学始

①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自序”第1页。

②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例言”第1页。

于明代嘉靖时期,是“活的文学”。郑氏关于中国文学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受到鲁迅的质疑,1932年鲁迅《致台静农》就认定郑著只是一部资料长编,并无多少新人耳目的学术创见。

20世纪初,钱基博《中国文学史》断论近古文学起讫时段为自唐至元,胡适认定近世文学的源头为桐城—湘乡派,周作人则认为它肇始于明末的公安、竟陵派。聚讼纷纭,近世的起讫划定一直未取得一致的意见。近世(近古)文学话题再度被学人关注,则缘于1996年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1999年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问世,章、骆二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将近世文学设置为金末元初至清末这一区间,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将近古文学框定在明代中叶至清末这一时期。这两部文学史著作断论近世文学的开端虽然各异,但就二者划分标准而言,大多考虑到社会新变和文学书写的新动向,其判断路径则异曲而同工。“近世文学观的变迁,其实质是什么呢?用一句话来概括,便是走出传统,走向当代。”^①从循环论向进化论演进,显示中国文学述古面今的文化症候,勾勒中国文学的近世镜像。梁启超《小说丛话》载:“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②宋代俗语文学和市民经济发展彰显了社会的近世特质,作为一定时代产物的文学,其演进不能脱离社会的发展状况,创作主体意识的强化,审美取向的日常化,如此根基于内省的宋型社会的近世风貌,以致自宋至清末的近世文学认定便获得了广阔的文化发展空间。

① 陈伯海:《文学史与文学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0页。

② 陈平原、夏晓虹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

第二节 近世易代之际诗学观念研究述评

历史是岁月飘逝后人们文化心理的积淀,如同山川草木的生长依赖于自然的规约,中国诗学演变必得受制于具体的社会和时代。以王朝为叙述单元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策略突出了作家或批评家的历史贡献,较好地勾勒出一个朝代文学或诗学的演变图像,却因其线性叙述掩盖了中国文学或诗学固有的丰富和多样。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云:“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①在陈先生的文学史视野中,以“诸文人之作品”为主轴,兼顾“时间先后”与“空间离合”两个维度,方能达到“总汇”之形态。立体考察文学现象或诗学变迁,既可勾勒一代文学转变和文体盛衰之因,亦可把握朝代鼎革之际文人心态和审美取向的杂多风貌,挖掘因为历史断裂或承续而被遮蔽的复杂的文学生态,有效绘制易代之际文学演变的时空图像。检讨历史和开创未来,近世诗学是中国诗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变的特定形态,中国的诗歌创作和诗学演变属意诗人个体人格的完满,中国诗学品格往往切近文学思想和艺术精神的取向。近世易代之际的诗学观念是文人性情的自然流露,它活态延续了中国诗学未曾断裂的传统,彰显中国诗学相对自足的演进脉络,凸显中华文脉千年一贯的自觉和自信。

^①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页。

一、体认易代诗学的地位与价值

中国诗歌有一条绵延不断的文化脉络,千年的诗歌创作沉淀了独具特质的创作范式,唐诗、宋诗和清诗被誉为鼎足而三的中国诗歌范型。晚清陈衍以“诗人之诗”来指代唐诗,以“学人之诗”来定格宋诗,那么清诗则是两大高峰之后集合式创新的存在。钱穆认为“宋朝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宋朝是现代中国的开始”^①。对传统的继承和反叛,开启近世诗学东方式的文艺复兴运动。宋代以降,中国诗学走上精细化的路子,诗歌创作逐渐地域化和私人化,诗歌表达的学问倾向加重,学问与性情常是近世诗人纠结的矛盾存在。源自魏晋六朝的精细化和自然化向度导引中国诗学的书写新路,衡以中国诗学的演进轨辙,近世易代诗学讲究法度与技巧,人工雕琢的痕迹越发明显,形成诗歌表达的世俗化趋向。叶燮《原诗》盘点中国诗歌演变脉络,形象地指出:“譬诸地之生木然:《三百篇》,则其根;苏、李诗,则其萌芽由蘖;建安诗,则生长至于拱把;六朝诗,则有枝叶;唐诗,则枝叶垂荫;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花谢而复开。”^②综括中国诗歌演进,自宋以降的近世诗学除清代性灵派等四大派别外,理论上并无根本性的突破,或杂取多家之说而折中平议,或沿袭前人而稍有增益,近世易代诗人宗唐祚宋,既是他们汲取传统的需要,也关联着其拨乱反正、提振诗风的文化诉求。近世易代之际的诗学创新涵盖了精神取向和艺术传统两个维度,形成中国诗学聚合式的全面更新。

^① 钱穆:《讲堂遗录》,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583页。

^② [清]叶燮等:《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碎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4页。

诗文向为中国文坛主流,明清小说作为一代文学的代表,其实并未撼动诗歌的文坛地位,近代之前的诗歌地位和创作实绩远非其他文体可以媲美,直至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小说因为政治救世神话一跃而为文坛主流,中国文坛秩序才有根本的改变。近世易代之际诗学传承古今,调和夷夏,民族关系和地域文化成为制约近世易代诗学生态的重要因素,呈现复古与创变的多声调夹杂的文化形态。易代诗学处于社会动荡、王朝鼎革之际,中国诗学的南北分野和固有的华夷之辨影响着近世诗学的基本格局,王朝转折时期的诗学近取前朝诗法,而在实际创作中民族关系又左右着近世诗人的文学取向。较之其他时期,宋元之际、明清之际的文人跟后建的王朝自然疏远得多,文人进取精神和济世情怀的淡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诗歌批评的贫弱乏力。刘飞《宋末元初诗学思想述略》既发掘改朝换代对诗人生活方式的影响,又客观勾勒易代诗人克绍艺术传统的复杂情形。其云:“宋末元初,尽管诗人们的创作分别表现出不同的流派或地域特色,但围绕着诗歌精神及怎样继承传统等都有着自己的思考,在诗歌的批评与创作中,宋末元初的诗坛正在建构出宗唐得古的诗学风尚,以致在有元一代乃至明代,宗唐得古已成为诗学思想的主流。”^①近世易代之际盛行的复古主义潮流,折射出专制日亟境遇下诗人对诗学本位的坚守。近世易代诗学的宗唐得古,旨在恢复古典的审美理想,是社会动荡情势和提振诗风突围意识的反映,彰显仰慕雄视万代李唐气象的文化诉求。抒写性情之真,宋元之际的唐宋之辨再现了诗人各具其致的诗学图像和诗歌价值认定,有利于他们进一步准确把握诗歌审美特征和发展趋向。

朝代鼎革不仅仅意味着新旧王朝的改变,它更是历史演绎的

① 刘飞:《宋末元初诗学思想述略》,载《中国韵文学刊》2008年第2期。

必不可少的浪花,往往伴随着文人身份与文化认同的矛盾、政治立场与价值观念的冲突。吟咏情性抑或言志书写襟抱,诗歌作为人们心理变迁和情感寄托的物态显现,必然会产生因时际会的诗歌取向和创作模式的改变。温世亮《鼎革易代与明初江右诗歌生态》以易代之际诗人的身份变化来考察明初江右诗坛的创作形态,他断论:“这种身份的变化或力量的分化,又使江右诗坛呈现出不同的创作形态。大致而言,明初江右的诗歌创作形态,又主要表现为雅正与自得两个方面。”^①元明易代,易代文人绝少遗民情结,大多在期盼新王朝的呼唤声中重新设置定位。雅正与自得是元明转关之际诗坛最为突出的审美风尚,或守性情之正,大肆倡导雅正的旨趣;或萧然物外,追求艺术的人生。诗人各取所需,对接新王朝来重新编织人生。易代之际的文学变迁,呈现形态各异观念趋向,有的朝代更迭过渡平稳,有的则不亚于经历一场天崩地裂的时代地震。“有的朝代的更迭,则不仅社会政治变动巨大,而且文学的观念、文学创作的内容和风格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似乎楚河汉界一样泾渭分明,由明入清诗学思想的转向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②较之近世其他的社会易代,明清易代的社会后遗症特别强烈,爆发了空前的社会危机和惨烈的文化灾难,诗人的精神趋向和诗学变革既深且广,影响久远。易代之初诸多针对明代诗坛的讨伐之声,不免夹杂些许批判和反省明代中后期以来国势不振的音符。正如一枚钱币的两面,诗学发展的另一情形亦不容忽视,中国诗学发展到明代,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明代是近世一个极重艺术的朝代,李贽对“童心”的呼唤、七子派对格调的讲究、公安

① 温世亮:《鼎革易代与明初江右诗歌生态》,载《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② 李世英、陈水云:《清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派“但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追逐,散发出明代诗学璀璨的光芒。毫无疑问,明代诗学的艺术特质增加了清代诗学的高度。

明清易代之后的清初诗学发展,仍无法抹掉明代诗学的影响,清初三先生对明代诗学的批判性继承就是一个有力注脚。异族问鼎并未割裂诗学的联系,对此,黄河的观点足可参考:“由此而论,时势的沧桑剧变,并没有真正打断古代诗歌思想在明清易代之际的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清易代之际,正是已经发展到明代的中国古代诗歌思想在一个特殊的时代、社会背景中暗中悄悄地充实自己、修正自己的蓄势蛰伏期。”^①改朝换代并不宣告诗学脉络的陡然中断,绵延不断的诗学发展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相对而言,一种诗学思潮的形成绝非孤立的现象,它往往植根于复杂的社会文化生态,有其庞大的文学家族和声。张兵考察清初宗宋诗潮的形成,清晰地指出明清易代改变了以往的宗唐得古轨辙,标举易代之际诗学的触媒地位。其云:“清初宗宋诗风的形成,原因甚多,但民族情感的转注当为主因,明清易代当为契机。明之亡于清,与宋之亡于元相类,历史情境的相似很容易使明遗民对宋朝产生好感。他们要表达故国之思,最好的方式就是依托遭际相同的宋亡史事,借前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②2014年,以左东岭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获批,学界日益关注包括易代之际诗学观念在内的文学思想研究。近世易代文学作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其意义和价值已逐渐得到学界的认可。切合近世文化生态开掘近世易代诗学资源,展现近世文化生态下的诗歌取向变迁,具有研究范式重构的色

① 黄河:《明清易代之际的诗歌思想》,载《华侨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② 张兵:《明清易代与清初遗民诗》,载《江海学刊》2000年第2期。

彩。近世易代诗学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应占一个独特的位置而被学界关注。近世易代诗学流派复杂,诗歌取向多元,它们呈现传承与创新的多样文化图景。勾勒近世易代之际诗学的传承流变,揭示中国诗学相对自足的演进脉络,其存在价值绝不亚于对某一主流文学现象或主流作家的研究。

二、变迁风貌与转变的关键人物

江山易主所造成的社会震荡、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辨加剧近世文人角色定位和文化认同之间的冲突,家国之痛、社会变革是近世易代诗歌书写的重要主题,山河破碎部分改变了文人颂圣酬唱的积习,他们书写战争火焰,反映民生凋敝的时代,从而形成新的诗歌创作高峰。蒙受亡国的悲痛,诗作成为动荡时代的实录。宋元之际的文天祥,身处战火纷飞的沧桑岁月,以慷慨激昂之声来显示文人的道义与担当;亦有如宋元之际的汪元量,痛感历史车轮碾压的悲苦,却回天乏术,便遁迹山林江河来谋求个体自适,“拒食周粟”,隐居不仕以全忠义。朝代鼎革所导致的创伤体验,促使文人从不同角度去反思和检讨前朝的制度和学术。易代之际的诗歌,缘于书写境遇的变更,往往批判性地继承前朝诗风和再估其文学价值,学术与诗歌书写的关联与互动,直接关乎近世易代诗歌书写的文化生态。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近世的宋代、清代与汉代鼎足而三,是受学术思想影响最大的朝代,它们适逢儒学发展的转折关口。诗人和学者的双重身份裹挟着近世文人,对前朝诗学和学术的批评往往是其改弦更张的契机,而这一改变多预设于易代之际,清人诟难明人的“袖手谈心性”与晋人“清谈误国”即为明证。情理之辨、复古与革新,以及诗学的学问化倾向与表达方式的整体性俗化,往往是近世文人必须拿捏好的文化难题。

宋代是近世文化昌盛的时代,自赵宋发端的唐宋诗之辨几乎

贯穿近世的始终,要么追步唐诗的风神情韵,要么礼赞思理筋骨的宋诗。近世易代之际因为唐宋诗之辨和时代境遇的变迁,自觉确立诗歌审美标准,势必走上选择诗歌书写范式的复古主义道路。元诗的宗唐得古、明诗的尊唐黜宋、清诗的名唐而实宋,这些诗歌审美取向多肇源于易代之际,且大多为前朝诗风的反动。宋元之际的方回斥逐宋季诗人功利化的倾向,担忧诗道沦丧,开出应时的拯救良方。“方回提出的‘格高’论与‘一祖三宗’说,有力回应了元初南方诗学的复古思潮,对于革除创作上的粗粝与卑俗之弊具有积极意义。他对诗歌修辞与音节的重视,以及为后学开出的一系列的师法对象,都是有迹可循的学诗路径。”^①激于元代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极端蔑视,古典主义在明代全面复兴。明初崛兴的古典主义诗学旨在抗衡宋诗的理性化和俗化,标举古典审美理想的回归。明清之际是清代诗学观念的发生期,注重经世致用的诗学品格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对明代诗学空言误国的反拨。明清易代之际叶燮的《原诗》批驳七子派不读唐以后之诗的认知误区,高擎主变说,为清诗“祢宋”观呐喊鼓吹。宋诗重学问、以议论为诗、讲究格物致知,这一切恰与明人的束书不观现象背道而驰,于是清人骨子里更认可宋诗,必然地尊唐与应然地崇宋。“明清之际的诗论家主变,归根结底都意在反拨七子诗派对汉魏盛唐的固执胶着,直接间接为宋诗开脱张目,为‘祢宋’诗学倾向提供理直气壮的依据。”^②复古主义弥漫的近世,其唐宋诗之辨不仅关联诗歌创作范式的厘定,还牵扯着诗人主变、守成的文化取向。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其传承与创新的根底仍多基于易代之际的文学思想。

① 陈博涵:《方回诗学思想与晚年趣味》,载《北方论丛》2013年第5期。

② 萧华荣:《中国古典诗学理论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5页。